

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暨 论文集
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

期望超越

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编
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

花城出版社

PDG

目 录

·开拓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局面·

- 1 饶梵子 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 5 朱淑一 植立于世界诸种文学之上的华文文学
- 14 青一威 文化人类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体化的可能性
- 23 潘亚敏 21 世纪文学新路向
- 26 林承璞 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走向
- 31 吴新铨 新世纪华文文艺创作的课题与
- 33 朱辉唐 同心协力，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建功立业
- 40 陈纯洁 女性文学视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 45 吴奕诗 近30 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以几届年会论文集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主体与文化身份研究·

- 57 朱立立 历史记忆、起源想象与身份建构
——以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历史书写及属性意识
- 65 颜永发 残存的集体记忆
——对马华文学“溯源之争”及“身份焦虑”的反思

7 曹惠民 出走的夏娃

——近 20 年台湾女性写作之演进

80 林 爽 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与使命

84 汤淑敏 海外华文女作家与中华文化

94 钟晓毅 写作的水土化与世界化

100 郑良树 海外华族历史小说的写作

103 陈鹤翔 陈小黑小说的杜巧

115 王宗法 张自先勇的文化乡愁

——从《台北人》、《纽约客》谈起

120 王剑丛 黄国彬散文的艺术自觉

129 方 忠 论余光中的游记散文

137 刘 强 东马诗歌艺术探赜

145 彭志恒 想飞的心情与飞翔的时日

——谈萧诗歌对生命的憧憬

150 王 桃 杜运燮笔下的热带风情

、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

153 东 瑞 琼学文学的生存环境与发展所想

157 南 薇 子规夜半犹啼血

——简论世界华文文学的现实处境

162 辛安东 存在的迷失

——论 20 世纪末留学生文学

169 陈瑞琳 “从花果飘零到落地生根”

——从留学生文学到移民文学探踪

- 175 少 君 北美华文文学中的网络文学
- 185 许福吉 现代诗的新方位
——一些马网络诗的国际交流
- 190 辛 马 铺天盖地话网络
- 195 甄 洪 论吴岸的华教礼赞诗
- 211 骆 明 在世界格局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
- 215 曾 心 从著作一斑表看泰华文学发展的脉络
- 218 陈博文 20 世纪的泰华文学著作

·区域性华文文学研究·

- 221 黄万华 从美华文学看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
- 226 施建伟 法人生——美国华文文学概观
——北美华文文学系列研究之一
- 231 樊洛平 源流与发现
——关于 40 年代后期台湾文学问题的讨论
- 240 文晓村 台湾《葡萄园》诗刊走过的道路
- 249 刘登翰 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
——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
- 261 袁勇麟 20 世纪香港小说与外国文学关系浅谈
——以刘以绳、也斯、西西为例
- 271 赵稀方 城市文化与香港文学
- 278 古远清 为重构香港文学多元化生态的努力和收获
——1998 - 1999 香港文学研究述评

- 286 陈 实 没有海潮的堤岸
——查证现代诗歌的运动形式
- 297 黄永健 散文诗，香港文坛的另一风景带
- 308 江少川 当代香港本土小说的流脉与嬗变
- 319 李敏文 两岸三地电视文化比较
- 324 吴希画 中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抗战戏剧运动
- 333 马 阳 超前意识的新兴杰出作家努白塔拉

·潮汕文化与潮人作家作品研究·

- 338 杨益群 薛汕与潮汕民间文学
- 345 蔡洪声 对促进潮人文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 348 陈双子 论潮汕文化规限下小说创作的思考
- 352 孙贤德 论《纸西竺的原住民》的文化意蕴和文学特色
- 357 司马波 至情的人至情的文
——谈司马波散文
- 361 陆小清 理想·境界·风格
——关于《苦子的报告》
- 373 黄景忠 论牧散文的文体研究
- 378 孙国靖 微真和他的长篇小說
- 383 翁奕波 睿智与深情交融的诗歌之美
——评司马波诗《人妖·古船》
- 287 蔡 子 情眼看凤姐
——兼谈潮汕文化

1. Bao Pingzi,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2. Zhu Chengqi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West End',
3. Xiao Cheng, 'Island and Independent: Immigrants in San Francisco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4. Peng Yuchun, 'New Image of the Immigrants in America',
5. Li Chengzhang,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World',
6. Wu Xindan, 'New Trend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New Century',
7. Zhu Chengqing, 'You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Immigrants',
8. Chen Chunlin, 'New Mass of Immigrants: Immigrants and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nts',
9. Wu Yali, 'Immigrant Chinese Business in America: Immigrants' Migration into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Boston in 1900s',
10. Zhu Li, 'Phases and Antecedent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migrant Chinese Family',
11. Yan Qianli, 'Reflection of the "Young Immigrants" in the "Early Wave" of Malaysian Chinese Immigration',
12. Guo Jidun,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3. Guo Jidun, 'Immigrant Immigrants and America: Immigrants in America',
14. Tang Shunlin,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15. Tang Xinyi,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16. Zhang Jianshi,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17. Che Honggang, 'The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18. Wang Zongli, 'The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19. Wang Jianshi,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0. Han Zhong,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1. Li Dong,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2. Peng Jitong,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3. Wang Yali,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4. Dong Han,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5. An Xiang,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6. Li Jianshi,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7. Chen Baoli,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28. Shao Jun,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 Chinese Immigrants',

176. Xu Fugui: O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Bei Mo's Web Poems
180. Fei Mao: A Luminous View of Lu Xun
183. Zhen Gong: On Wu Ai's Dynamic about Chinese Education
211. Luo Ming: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215. Zeng Xin: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ailand from A Book List
218. Chen Bowen: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Thailand
221. Huang Wanhua: Differenc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Oversea Chinese Literature Reflected by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
230. Shi Jianwei, Wang Yisheng: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America
232. Fan Luoping: A Discussion of Issues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Late 1940s
242. Wen Xiaoyun: The Way Taiwan Poetry Borrowed "Vineyard" Has Gone Through
246. Liu Dengnan: Taiwan Writer's Close Interest in Hongkong
261. Yuan Yonglin: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kong novel's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271. Zhao Xifang: Urban Culture and Hongkong Literature
273. Gu Yuanqiang: Transition on Hongkong Literary Research between 1998 and 1999
285. Chen Shi: The Development of Hongkong Western Poetry
297. Huang Yongjiao: Poetic Poetics: A New Journey in Hongkong Literary World
301. Jiang Shaohuan: Theme and Change of Contemporary Hongkong Native Novels
313. Li Xiaowei: A Comparison of TV Literature in Three Regions of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324. Mo Jiali: The Anti-Japanese War Drama Comparison on by Malaysian Chine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326. Ma Yang: Han Yuzhen: A Representative Singaporean Outstanding Writer of Chinese
333. Yang Yiqun: New Nuan and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345. Gu Hongsheng: Characteristics of Wang's New China People's Literature
349. Chen Yuezhi: Some Views on New Writing within Chao Shun Culture
361. Yu Xiangde: On the Cultural Sense and Literary Sentiments of "Natives of New Zealand"
365. Sima Gong: About Poem by Wang Li
368. Lu Shijing: A Report about Rong Zi
375. Huang Jingzhong: A Study on Poems of Qi Mu's First
378. Zhang Guopei: "The Zuo and the Nuo"
386. Weng Yibo: Poetic beauty described in the social wisdom and profound affection
388. Hong Zi: On Wang Xiang and Chao Shun Culture

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饶芃子

1996年，在长春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特别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1〕}1999年，在四川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华人文学”作为研讨会的重要命题之一，由于论题新颖，讨论十分热烈，成为研讨会的一个学术热点。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具有跨国别、跨地区的特点，如若有意识地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跨文化的视野中，或者说，把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投射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特殊的文学空间，使海外华文文学所蕴涵的内在的丰富性，有可能得到多方面的理论的诠释。

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写作的，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极需要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其审视和观照。海外华文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他们是处在居住国主流文化的“他者”，面对两种文化的接触，既有一个自身群体文化归属问题，也希冀能建立同主流文化交流的平等的“对话”模式，但这在现实生活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沟通中是很难实现的。这就使处于非主流文化的“他者”要自找出路：一是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边缘状态求生存；二是与主流文化认同，通过各种方式去化解、协调与主流文化的矛盾、冲突；三是相互兼容、互识互补，这往往是在一些文化差异不大的国家和地区才可能达到的。但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有一个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影响和融合的问题，而这些就会这样或那样反映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并非以本土的单一文化的眼光所能深刻理解的。

由于海外华文作家所在国国情不同，作家个人的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文化生存状态和对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因而在创作中对两种文化的隔阂、碰撞及其生存状态的感觉和表现就各有各别。为了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更具特色的问题，很有必要对其所处异质文化背景给予特别的关注。

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是中华文化。生活在西方的华文作家，因为原先的母体文化同所在地区、国家的客体文化相差较大，而且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总是居高临下“俯视”东方，还有种族上的问题，很难同客体文化平等对话或完全认同，他们不得不承受许许多

多的压力，在他们的作品里，既有个人生活的浪子悲歌式的抒写，也有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和对话的诉求。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主要接受西方教育的华人作家，或者是在国外出生的第二、三代华人，有可能完全倾向于西方文化立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只是作为一种纯然的个人和历史记忆来书写。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华人移居较早，数量多，文化交流频繁，而且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兼之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过去曾存在于殖民体系的掠夺之中，不象西方世界那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华文作家在那个地区生活和创作，虽不无文化疏离和阻隔，但经过不断调整，还是能走上两种文化相互兼容、互识互补的道路。这就自然形成了不同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不同特色。

海外华文作家移居海外，原因是多样的，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无数纠葛，他们的作品承担着各种关系的交织。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充满着异域感、流亡、放逐、陌生和对故土的回忆，他们在异国他乡坚持用汉语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意志的表现，是在异质文化环境里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对本民族文化理想的诉求。美国著名华文作家聂华苓就说过：“汉语就是我的家”。⁽²⁾瑞士华文女作家赵淑侠、泰国华文作家司马攻、新加坡诗人陈松沾（陈剑），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与母体文化的这种深切感受。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不断相遇那些跳荡的寻找着的心灵，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边缘与中心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心灵的呼应千姿百态。文学以其特有的形态，给人们留下了这方面各种各样细微、深邃的心灵感触。

为了探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展示其丰富多样的文化、美学价值，显现域外特性，在研究中既可以将其同大陆本土文学比较，也可以将中国本土以外各个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别、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由于与异质文化相互吸纳之后的变异，导致文学形态、美学模式、语言文字的变化，展示海外华文文学丰富的空间；还可以将一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华人作家群体进行比较，探索他们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创作状况，特别是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或同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接触中，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文学反映与选择，寻求其异同。通过这种多维的比较，从总体上更深、更广地认识、把握这一特殊文学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相当大，国别、地区、个体的差异性也很大，为了深入把握这一领域的有关论题，有必要对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其所面对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索。由于海外华文作家并非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存在，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使我们无法以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因此，文化身份也是我们切入研究极为重要的角度。

“身份”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中，是与对主体的理论反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虽然结构主义极力鼓吹主体的打碎或消解，但实际上人类并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那是一种对自我的认同。90年代以来，笔者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曾经多次论述应将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文本的研究方法，当中也包括要重视探索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说要重视对他们的“身份”批评和研究。

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所形成的

立场上从事写作，由于文化身份各别，作品也无不深深打上“身份”的烙印。从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众多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作家的文化身份十分复杂，可以说，每个海外华文作家的“身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求同存异，以种族为基础，他们也具有一种共识和身份认同——他们都是炎黄子孙，有华族血统，家庭体制和生活方式相似，而且是在异域以汉语从事写作。但在这些的背后，因作家“身份”各异，也有属于个体的更深邃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测。

海外华文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常常处于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经历或华人社区及家庭的影响，华族文化和价值观念已深深扎根于意识之中，而且经常以汉语写作，语言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在汉语的象形文字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定居或旅居异域，要在所在国立足，他们必须去接受或认同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学习新的语言，了解异域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和行为上的趋向与对本民族文化的执着和眷恋，使他们时时处于矛盾之中，不断思考和追问自己确切的身份，因而有无根的漂泊之感和“边缘人”的散聚心态。“身份”批评会提示我们去认识和研究这一“真实”。

海外华文作家有许多是从大陆、台湾移民的，有不少还是从大陆到台湾或香港以后才移居海外，移居地经常变动，其中蕴含的风风雨雨、离愁别绪、沉浮荣枯，引起种种难以言说的内心情绪，精神世界十分复杂，这是一个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群体，他们各有不同的时空和背景。就每一个个体而言，其身份具有任何人无法代替的独特性，又因为他们自身的流动性，身份往往是变动不定的。正是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以种族为基础的共识和身份认同，又因各自的差异性及流动性造成其身份变动不定，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纳入固定的类型之中，因而文化身份的研究就有助于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这也正是其精神和艺术活力之所在。

与身份的多重性及流动性相联系，海外华文作家的边缘性位置也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很深的印记。用汉语写作，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不仅是以写作来宣泄个人情感为他们自身言说和分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确认自身精神价值的方式。他们生活在异国他乡，在异国语言的喧闹中坚持以汉语书写，既是抵抗失语、失忆的努力，也是对母语、母体文化的依归。移居瑞士多年的华文作家赵淑侠，就曾经多次在散文中描述自己的这种心态。

对于边缘处境的海外华文作家，有种种无法备述的艰辛，但对文学创作而言，这些不一定是负面的。它有可能是作家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资源和财富，因为文学需要自身感受和体验的积累，也需要客观的审视和思考，海外华文作家的边缘性形成了他们文化上的空间张力，使他们不论对本民族文化，还是对所在国文化的回顾和思考，都获得了必要的距离，这种距离往往有助于客观的审视，使之与主观体验相抗衡。正如龙应台所说：“边缘人正是可以在他（她）无比孤寂中洞视两种文化的差异和交叠，从而检视自己和他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³⁾以他们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切入生活的角度与本土作家不同，他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不可替代的记忆与命运书写，是“民族”、“历史”、“文化”等互有联系的记忆与命运书写，在深层的文化意识中，主体的位置呈现出多姿多彩。

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里，有许多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对文学想象空间中不同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也是海外华文领域中一个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论题。在阅读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在表现本民族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常常涉及到不同民族人们的交往和关系，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所在国不同族群的人物形象，如白人、黑人、印度人、泰人、菲律宾人、马来人、印尼人等，还有华族与其他族群的混血儿。从中我们接触到不同文化体系作家如何理解、构造异族人物形象的问题。分析、追寻、研究这些文学中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到华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相遇时的各种不同状态，有助于了解作家在两种文化接触时所采取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对话”的依据，给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是处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一意识有时并不那么强烈。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在两种不同文化间差距所作的文化想象，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当中凝结有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对于作家笔下的“他者”人物形象而言，也是一种说明符指关系的描述。这些形象虽然来自异族，但他们是经过华文作家的文化眼光、文化心理选择、过滤、“内化”而成的，是作家从一定的文化立场出发，根据自己对异族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创造出的不同于本民族的异族形象，已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他”和“她”，而是他们在华族文化中的“镜象”和“折射”，是两种文化“对话”中生成的，可视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对这些形象进行分析，追问的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忠实生活的原型，而在于这种描述和表达，显示出作家所向往的是一个怎样的虚构空间，他们怎样以文学形式诠释异族文化，表现和追求怎样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范式，这种想象和描述产生了什么样的美学效果。

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应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论题，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如何在文化层面上展示这些文学作品的虚构意义，并未涉及艺术上的具体分析。因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样的研究，便已不是单纯的海外华文文学，而是与比较文化的穿透性视野相交、贯通，从而为比较文化和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一个共同的文化与文学研究结合的新视点。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注释：

(1) 乐黛云：1996年在长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2) 聂华苓：1993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三届世界华文女作家会议”上的讲演。

(3) 龙应台：《干杯吧，托马斯·曼——谈放逐中的写作》，见《读书》1996年第2期第4页。

挺立于世界语种文学之林的华文文学

——一个提纲挈领的初步梳理

朱双一

[内容提要] 世界华文文学应是包括中国内地、台港澳和海外所有以汉语创作文学在内的语种文学概念。它具有根源于中华文化底蕴的特有主题和审美表现方式；而西方文本对于“中国”难逃西方语境下的浮面化观察和误读，只有在华文文本中，“中国”才得以真实地展现；西方文学思潮和理论进入华文语境后普遍地被“创造性误读”和改造后运用。这些构成了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及其在世界语种文学之林中的个性存在。

一、作为语种文学概念的华文文学

70年代末以前，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未进入我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此后渐次得到了重视，并于90年代形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但它一般仅指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不仅名实不符，且引起海外华文文学是否中华文学等争议⁽¹⁾。我们认为，它应是跨国界的包括中国内地、台港澳和海外所有以华文（汉语）创作文学在内的语种文学概念。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世界接触程度等的不同，中国内地和其它地区，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学体验，如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社会更长期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对于新、老殖民主义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对于文化的错位、“现代化”的迷思（myth）和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也有较多的感受和认知；而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部分脉络如现代主义、自由人文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曾有二三十年的暂时中断或不彰，却在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坛得到延续。因此由仅指大陆文学的“中国文学”向“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概念的扩展，无疑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经验的一种丰富。

另一方面，世界华文文学使用相同的语言、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底蕴，而民族文化中必有一他人无法进入、剥夺和消解的本质核心⁽²⁾。探求华文文学体现出的这一“本质核心”，对于我们通过文学了解“自己”，增强民族凝聚力，不无裨益。然而，尽管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念已日渐深入人心，但在实际研究中，基本上仍分割成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各国的华文文学分别进行，其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研究。识者指出：现在很应该在开展国别华文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宏观的研究，探索其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寻找世界华文文学的某种共性和共同规律，

以便从总体上认识它，促进它未来的发展⁽³⁾。

如果进一步将华文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可见在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而建构的世界中，华文文学处于被漠视的“边缘”位置。克服“东方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建立华文自主的话语系统，实为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近一时期，后殖民主义理论使西方知识界对于自身和“他者”的关系深加反省，世界也进入多元文化的时代。21世纪，或将是东方崛起，瓦解西方中心的世纪，而华文文学也将世界语种文学版图中获得与它的内涵和成就相适应的，堪与英、法、西班牙语等西方语种文学比肩并立的地位，并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真实的东方、中国和中华文化，改变由西方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东方所形成之刻板印象的有效媒介。在这种背景下，对世界华文文学共同的文化、思想、美学特征进行综合、宏观的研究，以求把握世界华文文学有别于其它文学的总体特征，并揭示其向本土以外地区播迁、扩散时的变异和不变，从而认识如何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保持自我的主体性，确立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个性存在，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将华文文学定位为世界性语种文学加以研究，至少可从如下角度切入：1. 研究“中国”在华文文本与西方文本呈现中的差异；2. 华文文学的特有主题及其中华文化底蕴；3. 华文文学审美艺术表现方式的独特性；4. 西方思潮和理论进入华文语境后被“创造性误读”和选择、改造后的运用；5. 全球化趋势下的华文文学；等等。

二、华文文本与西方文本中“中国”呈现的差异

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在西方文本中，“中国”或“东方”只是“他者”，常呈现神秘的异国情调和落后、野蛮、愚昧、等待西方拯救的景象。即使一些对中国充满友好情谊的西方人士，也常难以根本逃脱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浮面化观察或误读。只有在华文文本（包括部分华裔西文作品）中，“中国”才得以真实地展现。

西方人隐约知道遥远东方有个产丝国度，始于希腊时代。中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地理大发现后，利玛窦等传教士，一方面把“福音”带到中国，另一方面也将中国文明介绍给西方。他们的介绍不再仅局限于地理、物产和风情，而是扩展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由此提供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茨、歌德、黑格尔等哲人认识中国的材料，并促成了“中国学”专门学问的诞生。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对于中国的民族性、国民性的关注、议论风气下，出现了“睡狮论”、“黄祸论”等论调，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又译斯密斯、斯密司、史密斯等）所谓“支那人的气质”的探讨，甚至对鲁迅有所启发。然而，即使被西方、日本学者视为对中国人性“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并广为引用的明恩溥的著作，仍处处可见对于中国的浮面观察和误读。鲁迅指出：“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斯密司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⁴⁾。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的序言中则写道“……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辜鸿铭以“约翰·史密斯”

特指那些自以为比中国人优越，想要以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中国人的英国人，指出：阿瑟·史密斯牧师最终证明“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他“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之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⁵⁾

赛珍珠或许是对“中国”产生误读、误写的又一显著例子。作为传教士之女，她的文本或可视为传教士文本的延续和变体。尽管赛珍珠以她描写中国农民的长篇巨著《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但正如弗兰克林·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全不理解”，她的小说也是对她所叙述的客体——中国农民的“整个误读”，而这种误读是主客体之间文化差距所造成的。《大地》中的主角王龙，他那抢劫、偷盗金子和珠宝来致富的方式，“实在是西方或者说近东、中东常见的奇遇故事，绝非中国本分、胆小的农民所能为的”；致富后，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赎回自己的爱的自由，“这种豪迈的诺言，决不是中国农民的语言，这是执着于爱的追求的西方人的浪漫”。应锦襄教授指出，布克夫人（即赛珍珠）是用殖民者的角度来观察，同时用殖民者的语言来阐释的，她对中国的种种深切的感情、深入研究，“都未能使她的认识高于纽约任何一个看看报纸的小知识分子：中国为战争与天灾所苦，农业生产落后，这庞大而困顿的国家正像嗷嗷待哺的婴儿那样仰望西方科学文明（或者说，就是美国）帮助救济”。⁽⁶⁾

与西方人的西文文本误读“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文文本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华人性格和心态的真切描写。这些文本对于颠覆西方历史文化典律，破除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抵御“新殖民主义”的茶毒，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华文文学就开始了对旅外华人生活的关注。在西方/美国的历史典律中，美国历史是奋斗者成功的历史；同时，美国历史又是多民族融合、共同开发的历史。依此典律撰写的西文文本，常呈现华人靠着他们的勤奋努力，创立事业，实现了美国梦。然而在一些叙述十九世纪华工在美经历的华文文本（包括部分华裔作家的西文文本）中，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1847年张维屏的《金山篇》⁽⁷⁾即叙写了华工赴美开采金矿，付出极大的劳动，而“米利坚人既获利，乃宅尔宅田尔田”，无理驱逐中国劳工的情景。1905年上海申报馆发行之佚名四十八回小说《苦社会》，堪称一部“华工血泪生活史”，自二十回以后，叙写旅美中国人遭受虐待的困苦处境，“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是书“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嗽石生《叙》）。与此相似的小说还有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吴沃尧（研人）的《劫余灰》，以及哀华的《侨民泪》，许指严的《猪仔还国记》，等等。支那自愤子的《同胞受虐记》、宣樊子《檀香山华人受虐记》等文，同样记叙了华人为美国的中西部开发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后来却受到虐待和迫害的遭遇⁽⁸⁾。直至当代，先后就读于港台的旅美诗人张错有报导文学作品《黄金泪》，而美国华裔女作家汤婷婷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以大量材料展示了华工修筑美洲铁路的艰辛历程。尽管可以说没有中国人就没有这条铁路，然而美国公司竟然禁止中国人参加铁路竣工的庆典，华工成为美国历史的缺席者⁽⁹⁾。

在当代题材的华文文本中，旅美华人早已由华工转变为留学生或一般的移民，然而

这些文本所揭示的海外华人生活同样说明，美国绝非一个多民族平等相处、任何种族的人只要努力奋斗就可获得成功的国度；而中国人或华人在美国遭遇的种种挫折和痛苦，也绝非华族文化、华人人种品质上有什么缺陷所致。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本也是对西方历史、文化典律的颠覆和瓦解。

由于1949年后台港澳和海外华人地区与西方世界有较早、较密切的接触，因此这些地区的华文作家，对于新、老殖民主义有更切身的体会，他们的文本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有着较多的吸收和引用，对于白种人的“东方主义”观念和新殖民主义行径，有着比大陆文坛更早、更强烈的揭露和批判。比如20世纪70年代，黄春明、陈映真等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就对入侵的美、日新殖民主义有着敏锐的警觉和强烈的反应。黄春明一方面在《锣》等小说中延续着鲁迅探讨国民性的路子，其对中国农民精神特征的准确把握和真切描写，以及他那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绝非当年明恩溥等西方所谓“中国通”可以相比；另一方面，他在《我爱玛丽》、《苹果的滋味》等小说中，对于美、日等国家依仗其经济实力，秉持其文化优越感和西方中心论，在台湾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腐蚀人的灵魂，培养依附于他们的精神奴才的新殖民主义行径，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生长于台湾，曾旅居美国和香港的台湾作家施叔青，在其以香港百年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频频采用后殖民主义的观照视角。如上所述，在西方的有色眼镜中，东方只是“他者”，东方人（中国人）呈现的是愚昧而又狡黠，木然而又残忍的形象。而部分东方人，也自惭形秽，一方面臣服于西方人鄙视的目光下，另一方面力图挤入西方主流社会，得到白种人的认同，然而这却可望不可即，正如他即使戴上白面具，也无法改变那有色的皮肤。施叔青《维多利亚俱乐部》第二小节中的一个细节，就颇耐寻味。俱乐部职员徐槐上班，特意开着已用了几年的六成新的车，穿着袖子短了一寸的旧西装和白袜子；总经理威尔逊的眼珠上下扫了他一眼，停留在徐槐白色的袜子上，认可地把眼睛转到别处去，心里却说着：“这些中国人，穿白袜子来上班！”徐槐想起有个周末上午，自己因热恋中而戒备之心松弛，穿了件名牌恤衫和麻纱白长裤来上班，和威尔逊的一模一样，与威尔逊照面时，慌得他借故和人约，返身便逃。作者从她在殖民地香港的切身感受中写下这一细节，对于白种人的以及某些买办的“东方主义”心态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

台湾原住民作家瓦历斯·诺干也试图用后殖民主义方式解读日本人芹田骑郎作于台湾光复之际的小说《由加利树林里》。瓦历斯·诺干指出，日据时期总督府视“教化蕃民”、制造原住民仰赖帝国的情结为其要务；出于一种普遍的“殖民习向”，日本的人类学者、殖民警察、官员的各种论述中，建构了台湾原住民“蛮荒的”、“土著的”、“原始的”的形象，认定泰雅人为“骄横的”、“无礼的”人种，并强调“国家”胜于“本土”、“城市”胜于“荒野”、“科学”胜于“蛮荒”的殖民概念；而《由》书的作者将其在台湾的由加利树林里与“高砂族”共度的时光，视为其一生中“比什么都美丽的一段日子”，留存着十数年后仍难以忘怀的“甜美的回忆”，此外还发出“高砂族女性爱慕内地人的男性而发生恋爱，便是过去雾社事件的肇因”等论调。这些说明作者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和帝国心态。瓦历斯·诺干指出：“萨伊德在考察英国文学与文化中的殖民意识与

帝国心态时早就发现,自十六世纪以降,殖民意识与帝国心态即已是英国普遍的社会性情,是国民一般习向的一部分,各式各样的文化生产与实践论述都受到这样的社会习向的约束与规范,它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意识。”⁽¹⁰⁾显然,和十六世纪以来的英国一样,殖民意识和帝国心态也成了当时日本人的一种“集体的意识”,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这种意识和心态是需要深加检讨和批判的。

这些随手拈来的事例充分说明,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对于新、老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有着深切的感受,因此也会有比大陆文学更为强烈的描写和表现。这也是它们为整个华文文学所作的、大陆文学未必能与之相比的特殊贡献。

三、变形的必然:西方思潮和理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学思潮和理论进入中国和海外华文语境,受到中华文化框架的选择、过滤和改造,又在艺术实践中发生变形,它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西方思潮和理论。这种情况常使这些思潮、理论的引进者遭受“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讥。如夏志清就曾认为台湾的现代派是比西方现代派更为下等的东西,因他们只是滥竽充数、拾人牙慧之辈⁽¹¹⁾。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认可一种文学思潮、理念和创作方法进入另一文化的语境之中,就如光线进入水中发生折射一样,其变形具有某种必然性,那对这种现象也就能加以理解,并给予正确的评价了。

这里仍以台湾文坛为例来说明这种西方思潮和理论的“中国化”现象。5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始作俑者纪弦以学习、移植波特莱尔以降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号召,但台湾的现代派,绝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派。首先,台湾的和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并不一样。西方现代派文学是趋向烂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在50年代台湾,总体上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并无产生现代派文学的必然社会经济条件,因此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乃源于其他原因所引起的类似的精神状态。或者说,西方现代派的“孤绝”、“疏离”等来自对工业过度发展的反应,而台湾作家的“孤绝”则多来自极其复杂的政治、历史、家园情结,后者仍从前者那里找到了适合表现自己这种“孤绝”的内心世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一种发声源不同但音调相似的谐振共鸣式的回响。正如白先勇所指出的:事实上廿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乱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社会和价值更遭到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可谓旗鼓相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我们能够感应、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¹²⁾

其次,台湾的现代派文学,无论在主题或是表现技巧上,对于西方现代派都是有所取舍和改造的。在主题表现上,台湾的现代派具有内向性和抽象化的特点,相应地,对于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有较多的摄取。而这种特点的产生,与当时台湾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作家心态,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当时客观的环境并不可爱,作家也就向内转,寻求内心的自我安顿和自我意识的肯定;周围具体的现实不可触摸、不忍卒睹,于是转向关心生与死、爱与恨等抽象的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在艺术表现上,则对于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派等,有较多的借鉴。然而,这种借鉴也仅是部分的而非全盘照搬。如尽管创世纪诗社标榜超现实主义,但其实际创作中,真正尝试“自动写

作”的仅有商禽等少数诗人的少数作品，更多的是将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和部分手法，化用于新颖、奇异、出人意表的意象经营中。

其三，经过一段时间的消长起伏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往往作出自我调整和修正，因此与它所取法的原形，有了更大的区别。如60年代超现实主义风潮过后的洛夫，力求对超现实主义作出新的广义的解释，并力图将它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禅、性灵、顿悟、“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等概念和说法乃至具有道家色彩的“天人相通”、“物我交融”等相连接。其后期的创作，明显显示出传统因素、客观因素、理性因素增加的趋向。此外还有张默、罗英、商禽等等的创作，因此可以说，超现实主义的诗精神始终在台湾诗坛不绝如缕地延续着，但它已不是完整、严格意义的超现实主义，而是经过改造、融入中国传统因素的，有所取而又有所舍、剔除某些成份而保留某些艺术精神光点的超现实主义。

80年代“后现代”的引入台湾，也同样遭受“东施效颦”之类的批评。我们却认为，某种程度的失真、变形，是自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一般认为，后现代文化思潮是伴随着后工业社会而出现的，资讯事业的高度和大众的商业、消费取向，是后工业文明的两个最显著特征。就总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台湾目前尚未进入后期资本主义阶段，但由于电子制造业的特别发达以及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而引发的服务、消费行业的勃兴，使台湾社会提早出现上述两种特征，因而在某些方面或层面超前地进入后工业文明状态，为后现代文学的问世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背景。台湾社会的这种尚属过渡阶段的特殊性，也必然导致台湾后现代文学的某种变异。80年代后期，台湾正值“解严”，伴随“解严”而来的纷杂、散乱、多元，使台湾的后现代文学，在“分解和重组”、“多元平面拼贴”上，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台湾钱淹脚目”的财富膨胀和奢靡享乐风气，使文学也出现媚俗化、商业化的潮流。而资讯传播业的发达以及台湾社会特异的骗局风格，导致质疑语言等媒介能够如实反映事实，进而质疑习惯说法乃至官方说法之真实性的“后设小说”、“后设诗”等，也格外的兴盛。

值得指出的，这种西方思潮和理论“中国化”的现象，在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普遍性。如清末梁启超借鉴西方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中国固有之“文以载道”观念，提出“小说救国论”，形成近现代华文文学的“感时忧国”、富有政治使命感之传统；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文艺思潮被压缩地在文坛匆匆过了一遍，并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拿来主义”所选择和修改，而单那“匆匆过一遍”的形式，显然也与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80年代以后，后现代、魔幻现实、后殖民、女性主义等众多西方思潮和理论分别引进海峡两岸文坛，并被进行适应于中国特定情境的“创造性误读”。“中国化”的原因之一，乃中国人、华人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深刻的悖论：既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全盘西化”又行不通，有时更深受其害。政治上、文化上的诸多教训使华人形成一种警惕心理和普遍认知：学习西方须不脱离传统的根基，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这是每当西方思潮较大规模地被引进时，经常紧跟着“现代”与“传统”关系的讨论，乃至出现“回归传统”潮流的原因。

更应指出的，对于西方思潮和理论的“中国化”改造，使华文文学保持着有别于西方文学的鲜明个性和主体性。基于此，我们不必为某些文学思潮不同于西方相应思潮的